



旭日升 张成林 摄

大年夜随想

王族友

时光飞逝，又是一年大年夜。

除夕年年有，今岁不寻常。窗外的雨，淅淅沥沥下着。今年禁放烟花爆竹，效果相当明显，这个大年夜安静多了，说明时代在进步，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，千年习俗也在改变。一年一度的春晚，也如期上演，观看时，受烟花爆竹的打扰不多。大年夜能在家享受这份悠闲，那是拜天所赐。从夏末开始，一直艳阳朗照，使得这个冬天寒意全无。将近过年时，又连来了几场及时雨，对我们公路人来说，春节期间，我们既不要去铲雪除冰，也不用去森林防火，春运保畅通的任务出乎意料地变得如此轻松。

坐在电视机前，春晚其实一点儿也没看进去，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武汉出现的那个猖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这几天它露出了尖牙利爪，威胁着同胞的生命。每天感染病的人数在攀升，传染的范围在扩大，给这个快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添了堵。我们没有退路，只能勇敢地应对。武汉主动封城了，那是为了将传染源尽可能控制在自己的地盘上，也可以说是武汉在为全国做贡献，我们应该感谢武汉，支持武汉，与武汉同在。同样在这祥和的大年夜，全国还有多少医务工作者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，主动请缨，逆行而行，从四面八方开赴武汉，冒着风险，与死神抢时间，比速度，挽救那些重症患者。刚刚，在视频上看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150人医疗专家小组，大年夜冒着大雨乘包机奔赴武汉前线。画面确实感人，危难时刻，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，我们能够坐在家乐享天伦，那是因为有他们在负重前行。

人在大自然前还是十分渺小的，天生万物，互为依存，才能各得其所，共畅天机。人只是生态链中的一环，正确认识自己，是必要的；正确对待自然，更为必要。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冠状病毒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玩意，就能把祥和的春节搅和成这样。非典过后，我们已信心满满，都认为冠状病毒这个妖魔已经被我们降服，收进了吸风瓶中。十七年后的今天，还是冠状病毒，在暗处翻新了个花样，依然掀起滔天巨浪，搅得天下不安。试想，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尊重其他生命，不妄贪口舌之福，不滥捕滥杀，可能就不会有这场厄难。从这点看，这确实有点像种因得果的报应，当人们野蛮地享受野生动物美味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自饮毒鸩，最终自食其果。幸好人是万物之灵，疫情出现后，短短几天就揪出了冠状病毒这个元凶，并立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，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也立马在全国范围打响。

这次疫魔在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发难，又发生在人员流动非常大的春节期间，对我们这个十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来说，确实是一场严峻考验。但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，我们中华民族向来百折不挠，越大敌当前，越能奋勇向前，万众一心，共赴危艰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正是这种精神，让我们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，把一个风雨飘零的旧中国建成了活力四射的新中国。

想到这里，我坚信，新型冠状病毒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就一定能很快结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并取得彻底胜利。

新女婿，老女婿

雪柏

去岳父家，大多是在春节。第一次去，是新女婿。年三十，下午三点了，年饭还没影子，我有点奇怪：这是啥风俗啊？我老家那边一般中午十二点左右就开始吃年饭了，性子急的人家下午一点的时候差不多吃完了。转到厨房，见岳父、岳母和两个小姨子忙忙碌碌，我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，便担着水桶去门前的河汊挑水，水担回来的时候，对门的三婶正好瞥见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大姐夫还真像个做事的样子嘛！”我吭哧吭哧的，还要对她做出笑容，实在是有点吃力。岳父见我把水挑进厨房，提着嗓门说：“哪要你挑的哟，你喝喝茶，我过一会去挑！”我没吭声，担着桶又往河汊去，我要是真是把水桶放下来坐着喝茶，岳父大人说不定会想：这是个什么怪女婿啊！

水缸装满了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坐着喝茶，顺便吃了几块桌子上的花生糖、芝麻糖，这两种东西比我老家的差多了——我老家的花生糖是名副其实的花生糖，除了点儿糖稀，裹的都是花生米，但这里的花生糖只有几粒花生米，掺杂着太多的炒米，芝麻糖也是“水货”，照样有很多炒米。好在岳母很快就端来了面条让我打尖，大蓝边碗盛的，没几根面条，却赫然卧着一根系了红丝线的鸡大腿，还有五香蛋。

天黑了下来，岳父炸响了几串鞭炮，年夜饭正式开始，我被让到四方桌靠东的首席上。我推辞几下，最终还是被岳母拉着坐下了。桌子的上方坐着岳父、岳母，妻子的奶奶坐在上方的最中间，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，还能喝酒，头脑也十分清楚。大概是有我这个新人加入的原因，岳父本来话就少，此时更少了，而我也还是初来乍到，不好贸然发挥插科打诨的特长，桌子上的气氛有些沉闷，好在睡在摇窠里的女儿适时醒了，发出一声嘹亮的啼哭，妻子赶紧起身去侍弄，岳父像酒醒了似的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我敬你。”他伸过来的杯子和说出的“敬”字吓我一跳。我老家那边长辈从不会“敬”晚辈的，晚辈“敬”长辈，也只用“陪”这个词，比如我弟弟会说：“大，我陪你喝一杯。”“陪”字轻松、随意，但与“敬”字相比，文化含量显然差了一个档次。

年饭之后，奶奶要回到大门对面的小房子里，我拉着她，让她多坐一会，岳父说，让她回家吧，我们等一会再过去。过了一会，岳父开始往奶奶的小屋子里去，岳母、两个小姨妹、小舅子也跟着，妻子对我说，我们也去，抱着女儿过去了。奶奶端坐在屋子中间的一把椅子上，面前还有只蒲团，我正有些疑惑，小叔率先跪倒了，双手合十，额头着地，连磕了三个头，奶

奶从棉袄的内层里摸出一个红包递给他，小叔起身，笑眯眯地接过红包。其他人依次效仿，也都分别得了个红包。

我们这一家子磕完了之后，三叔、四叔家的人都来了，我们赶紧撤。回到家里一看，奶奶给的钱包居然是19块6毛5分，我问岳母是啥意思，她道：“零钱是子孙钱嘛！多子多孙啊！”岳母说完，又朝我岳父叫了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发压岁钱！”岳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沓子红包，一个一个发，我们家得了三个，每一个里面照样有几毛几分的“子孙钱”。

年初一，我和妻子分别给住在同村的三叔、四叔拜年，又去给村西头的二伯伯家拜年。二伯伯和我岳父是堂兄弟，但年龄比我岳父要大近十岁，他和二儿子住在一起。老人家也曾是做教师的，性格极为开朗、乐观，退休后大半天四处走访亲友、学生，不出门的时候，就在房间里写诗，在方格作业本上写，见了我，拿出一沓子古体诗，让我点评，我哪懂古体诗啊？翻来覆去地看，只能说写得还好，老人家眯眯笑，显然很开心。

年初二开始，三叔、四叔和二伯伯家陆续请客了。先在三叔家吃，我照样被安排在四方桌靠东的首席，我这才知道那是属于新女婿的“专座”，别的人谁也坐不得。酒席之前是早茶，象征性地吃点糕点、五香蛋，然后开始上酒。才九点多啊，怎么就喝酒了呢？好在我酒量有点大，心里不怕。酒斟进杯里，三婶端过来一只碗，把里面的一根系着红丝线的鸡大腿夹到我的碗里，我要推辞，她道：“是给新姑爷吃的。”

妻子家的亲戚多，去每一家拜年，我都吃了鸡大腿，系着红丝线的。妻子的堂哥们都无一例外地称我“大姑大大（姑父）”，那是他们按照家里孩子的身份称呼的，隐隐里有着谦敬。这也是文化吧。

我吃了若干年鸡大腿之后，两个小姨妹、小舅子和妻的堂弟、堂妹们陆续成了家，我沾妻子的光，又成了她们老公和老婆的大姐夫。拜年时，我这个老女婿和新姑爷们一道上门，三叔、四叔和二伯伯家的鸡大腿不够用了，他们也不再跟我客气，把仅有的几根鸡大腿给了更“新”的女婿，不过四方桌靠东的首席一直是我这个大女婿的专座。四叔家请客时，他一趟一趟跑过来，看我还在躺着，终于憋不住，开始调侃：“老女婿了，想睡到几点就几点嘛！”

现在，我是更老的女婿了，晚辈中，有更多的人叫我“大姑大大”，还有人叫我“姑爹爹”——我成了爷爷辈了，长辈中，奶奶、二伯伯、四婶、小叔叔已不在人世，过年时只能想念他们。